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动因探究*

——基于 QCA 方法的组态分析

余 珮 陈漪澜



(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内容提要:传统对外直接投资(OFDI)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进程是渐进式的。然而,在新兴经济体中,却存在一批在成立短期内快速进入海外市场的天生全球化企业。这一现象当前仍未得到共识性解释。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从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三个视角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EMNEs)天生全球化的缘由进行理论阐述,并以2008—2019年178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揭示EMNEs天生全球化的复杂动因。组态分析结果表明: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的“多重条件并发”形成EMNEs天生全球化的多样化组态模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创新成果导向、天生创新导向、创新过程导向、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行动前摄性和风险承担性七要素构成六条组态路径和四种EMNEs天生全球化模式。与此同时,不同前因条件间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创新优势方面,创新成果导向、天生创新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在不同情境下两两之间存在叠加或挤占效应;海外社会网络方面,弱关系网络和强关系网络之间存在挤占效应。本文从组态视角系统地解释了EMNEs天生全球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OFDI理论的知识体系,为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新创企业“走出去”提供实践启示。

关键词:天生全球化 对外直接投资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 定性比较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4)01—0111—21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大量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emerging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MNEs)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与配置。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①,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在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乌普萨拉模型(Uppsala model)认为企业国际化是学习和知识积累的渐进过程,获得经验知识成了企业进行国际化的动机(Johanson和Vahlne, 1977)^[1]。尤其对国际竞争优势相对薄弱的EMNEs而言,国际化承诺路径的渐进性和经验学习的

收稿日期:2023-03-13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国际经济规则重建的理论逻辑及中国战略选择”(19ZAD0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价值双环流下中国先进制造企业国际竞争力脆弱性的防范策略研究”(19BJY107)。

作者简介:余珮,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电子邮箱:peiyu_paris1@whut.edu.cn;陈漪澜,女,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电子邮箱:chenyilan1997@163.com。通讯作者:陈漪澜。

重要性更为凸显(江诗松等,2022)^[2]。然而,一些年轻企业在不遵循路径依赖的情况下仍成功国际化(Knight和Cavusgil,2004)^[3],呈现“天生全球化(born global)”特征。天生全球化的概念最早由麦肯锡公司提出,用来描述澳大利亚企业在成立不久后就大规模出口的现象(Mckinsey,1993)^[4]。随后,学者们分别从时间和国际市场份额维度对天生全球化、国际新创企业等概念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界定(Oviatt和McDougall,1997^[5];Knight和Cavusgil,2004^[3];Oviatt和McDougall,2005a^[6])^①。天生全球化现象的出现极大地削弱了传统OFDI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导致渐进主义的乌普萨拉模型与围绕天生全球化的范式之间的理论碰撞(Love等,2016)^[8],进而引发了国内外学者对其背后驱动机制的思考。

早期的研究聚焦于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advanced MNEs, AMNEs),并将AMNEs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因素归因为企业的动态学习能力。新创企业筹备进入海外市场时,会优先考虑追求创新和获取新知识的必要性,同时灵活的组织能力和浓厚的创新文化会鼓励企业配置有限的创新资源、发挥创新优势,从而帮助新创企业在缺乏有形资源的条件下成功实现国际化(Knight和Cavusgil,2004)^[3]。EMNEs天生全球化是否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或是存在其他的驱动机制?现有学者普遍认为,新创企业借助海外社会网络可以快速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这些网络资源不仅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也作为“中介”降低了EMNEs的外来者劣势(Sharma和Blomstermo,2003^[9];Fu等,2017^[10])。同时,富有国际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可以敏锐地察觉出海外新市场的商业机会,追逐利润的本能驱使企业高效整合资源,从而快速国际化(Zahra,2005^[11];Zhou,2007^[12])。

虽然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EMNEs天生全球化的动因,但相关实证研究专注于对单个理论视角的检验。事实上,传统单一视角的研究并不能充分解释EMNEs天生全球化的现象。从具体案例来看,当前中国新创药企的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国际准前沿”,但许多新创药企仍未“出海”,或者缺乏国际化的“勇气”。企业管理层认为,海外合作伙伴对生物医药企业缺乏信任、对海外销售市场认知不足是中国新创药企未选择国际化的关键“痛点”^②。该现象表明,仅拥有创新能力无法使企业天生全球化。此外,如果初创企业在不具备国际化的相关综合条件时就盲目“走出去”,也会遭遇失败。以佰草集为例,由于缺乏独特的品牌包装设计和深入的海外市场调研,其对中国香港的品牌出口以失败告终。因此,在探索EMNEs天生全球化问题时,需要关注不同理论之间的协同和整合,重视多个影响因素的联动效应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Cavusgil和Knight(2015)^[13]也指出,现有研究多是依赖于单一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天生全球化,迫切需要制定综合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新的研究命题。在理论探索中,杨忠等(2007)^[14]基于国内外天生全球化企业的特征,利用案例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多视角、系统性的整合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企业天生全球化现象,并提倡未来研究者综合考虑多因素的互动。薛求知和周俊(2007)^[15]认为,只有企业资源、国际化网络和企业企业家精神的良性互动才能确保新创企业成功国际化。现实中,以充电器领域为代表的中国新创国际品牌Anker体现了利用组态思想解释天生全球化的必要性。Anker在成立三年内快速成为中国出海品牌前十位,企业创始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曾就职于硅谷的Google,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视野和商业关系网络。企业的研发投入领先,拥有丰富的知识产权和研发专利,并将“弘扬中国智造之美”作为品牌使命,富有民族特色的企业家情怀。

① 现有研究通常将天生全球化企业和国际新创企业视为同一概念,本文统一使用前者。在文章中混合使用“年轻企业”和“新创企业”。Oviatt和McDougall(1994)^[7]的定义包括:(1)年轻的国际化企业和新创企业;(2)存在一系列价值链活动;(3)存在各种进入海外市场的策略,包括国际直接投资。Knight和Cavusgil(2004)^[3]的定义更强调早期和快速国际化的企业,包括将出口作为主要国际进入模式的年轻企业。

② 澎湃新闻.中国创新药企“出海”,数据、人才、对监管法规的了解是关键[EB/OL].(2023-10-20)[2023-11-20].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998150。

然而遗憾的是,EMNEs天生全球化是否为多因素驱动?多因素又如何驱动?至今尚未在实证分析或者定性分析上进行探索,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在当前国际商务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研究方法适用于探索单个变量的净效应(Fiss,2007)^[16]。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被认为是探索“联动效应”和“互动关系”的有效方法,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商务研究(张明等,2019)^[17]。鉴于此,本文在参考现有文献和相关经典文献述评的基础上(Cavusgil和Knight,2015^[13];Zander等,2015^[18]),尝试利用中国天生全球化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全面刻画、揭示EMNEs天生全球化的因果复杂性。本文重点探寻包含创新优势(创新成果导向、天生创新导向、创新过程导向)、海外社会网络(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行动前摄性、风险承担性)的三大驱动因素是否是实现EMNEs天生全球化的必要条件,以及上述要素如何有效组合而形成不同的组态以实现EMNEs天生全球化。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不仅能够充分理解EMNEs天生全球化的复杂本质,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且还能为年轻企业匹配和培养成功实施“走出去”所需的互补性或替代性条件提供实践方案。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 文献回顾

渐进式企业国际化理论认为,国际化是一个困难且缓慢的过程(Vahlne和Johanson,2017)^[19],管理者在实施海外战略前需要获得经验性的信息和知识。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企业都与乌普萨拉模型所描述的一致。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成立短期内快速国际化,专注于在遍布商业机会的国际市场寻求客户和利用全球资源获得竞争优势,学者们将其称为天生全球化企业(Knight和Cavusgil,2004^[3];Cavusgil和Knight,2009^[20])。

国内外学者对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广泛讨论。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AMNEs,从产业和制度等宏观视角出发探讨母国要素对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影响(Fernhaber和Li,2010)^[21]。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的国家环境和政策更加不稳定,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母国宏观因素对EMNEs的影响是模糊的(Marcotte,2014)^[22]。此外,贸易自由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东道国市场的优势吸引着新创企业对其开展海外业务(Gerschewski等,2015)^[23]。然而,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的环境要素,均无法解释为什么面临同样的外部环境,只有部分企业实现快速国际化(杨忠等,2007)^[14]。Hong等(2015)^[24]以EMNEs为例的研究也表明,国家竞争优势对企业海外扩张的促进作用取决于企业的技术资源和营销资源。因此,本文认为,个体的微观因素真正决定了企业是否天生全球化,而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仅仅是催化剂。

Knight和Cavusgil(2004)^[3]的论文从微观视角构建了企业天生全球化的理论体系。在Knight和Cavusgil(2004)^[3]的基础上,学者们基于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内部资源促进了企业天生全球化。该视角下的企业资源是高附加值的、不可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Barney,1991)^[25],其中,创新优势是企业无法被其他企业轻易复制的无形资产和有价值的资源,是推动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关键驱动力(Behl等,2023)^[26]。关于创新优势对天生全球化的研究可以归为两类:一类研究遵循内部化理论(Buckley和Casson,2009)^[27],认为企业独有的创新资源和能力形成了年轻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高效配置创新资源和发挥创新能力开发的新产品为开拓海外市场奠定基础,帮助新创企业在全世界范围追求利润最大化(Knight和Liesch,2016)^[28];另一类研究将天生全球化作为知识和创新优势之间的桥梁,认为企业内部的创新文化和对创新知识的诉求加速了新创企业建立、积累创新优势的速度,强调从国际化中学习,从而获得核心竞争优势(Oviatt和McDougall,2005b^[29];Weerawardena等,2007^[30])。

除此之外,天生全球化研究中最重要进展之一是在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探讨社会网络对企

业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大量研究表明,天生全球化企业从社会网络中获益巨大(Cavusgil和Knight, 2009)^[20]。社会网络可以为新创企业提供融资机会、市场准入资格和分销渠道(Coviello, 2006^[31]; Coviello和Cox, 2006^[32])。进一步地,社会网络在解决年轻企业资源短缺问题的同时还帮助企业识别海外机会,促进企业开发知识密集型产品,以此提升国际绩效(Mort和Weerawardena, 2006)^[33]。以EMNEs为对象的研究中,Zhou(2007)^[12]发现,社会网络为中国新创企业提供了国际商业知识,并增强了企业与东道国合作团队之间的信任。杨忠等(2007)^[14]利用跨案例研究也证实了社会网络对中国企业天生全球化的重要性。

企业家是企业创立和运营的核心,肩负制定企业战略的使命。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家视角下,富有国际企业家精神是天生全球化企业的突出特征(Rialp等, 2005)^[34]。Miller(1983)^[35]总结了在简单型企业、计划型企业和有机型企业中企业家精神的决定要素,并认为创业型企业积极地从事创新,敢于承担风险,并表现出超前的认知能力。在此基础上,McDougall和Oviatt(2000)^[36]将国际企业家精神定义为“跨越国界的创新性、超前行动性(前瞻性)和风险承担性行为的综合,以实现组织内的价值创造”。尽管现有文献对国际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界定并不统一,但均认为其可以推动企业天生全球化。Zhou(2007)^[12]总结了主动性、创新性和风险寻求性是企业家创业倾向的三个维度,并证实主动性对中国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影响最大。类似地,Acedo和Jones(2007)^[37]发现,管理者的风险感知和主动性会影响企业是否快速国际化,天生全球化企业更愿意承担风险,对国际扩张也更加积极主动。富有国际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还可以通过声誉机制接近海外上下游企业,以此抓住国际市场的机会,实施快速多国化的市场进入策略(Vanninen等, 2017)^[38]①。

综上所述,企业天生全球化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在研究对象方面,大部分研究关注AMNEs天生全球化的动机,而对EMNEs天生全球化现象关注不足。现实中,大量EMNEs成功“出海”,并快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与AMNEs相比,EMNEs更容易受到投资歧视并存在合法性劣势,叠加新创企业天生具备的新企业劣势,使得EMNEs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因素值得进一步挖掘。然而,当前EMNEs快速国际化的内在机理处于“黑箱”状态,因此迫切需要总结EMNEs天生全球化的驱动机制。第二,在理论视角方面,既有研究基于多个因素独立展开探讨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动因,成因解释丰富。但现有研究对不同理论之间的协同与整合缺乏关注,单一视角的研究结论可能与现实产生矛盾,这导致得出的结论尚不够完备、无法真正解释EMNEs天生全球化的内在机制。第三,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大多倾向于探索特定因素的“净效应”,而忽视多个相关因素的“联动效应”和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天生全球化是新创企业一项复杂的战略选择,理论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素之间的互动也可能会产生挤占效应或叠加效应。因而有必要运用新的方法探索EMNEs天生全球化的深层缘由。

2. 理论基础

相关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的创新资源和追求知识的创新文化形成了新创企业独特的创新优势,加快了企业国际化的步伐。社会网络的缔结抵消了新创企业有形资源短缺的劣势,企业利用社会网络来识别和利用新的市场机会,继而降低海外运营的风险,从而推进国际化进程。在制定全球化战略时,具有国际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会在投资时体现出较强的创新性、行为前瞻性和风险承担性,进而快速实现国际扩张。因此,本文尝试从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的多因素组合视角梳理影响EMNEs天生全球化的理论基础。

(1) 创新优势与天生全球化。创新优势驱动企业天生全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

①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学者基于企业家的创业动力、创始人团队和等视角考察了影响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因素,但多数文献实质上仍揭示了创新优势、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是微观层面推动新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动力机制。

创新资源和能力发挥海外市场“入场券”的作用；二是通过国际化来提升创新优势，从而建立企业国际竞争力。

一方面，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内部拥有的独特资源和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Barney, 1991)^[25]。大型企业的资金充裕，人力资本丰富，而新创企业缺乏可用于国际化战略和应对全球市场波动的有形资源，更倾向于利用知识、技术等无形的创新优势来培育海外市场。Autio等(2000)^[39]指出，企业能否成功创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拥有创新性的产品。天生全球化企业擅长依靠独特的产品，利用中小企业的灵活性瞄准传统大型跨国企业无法服务的细分市场(McDougall和Oviatt, 2000)^[36]。此外，丰富的创新资源也有助于年轻企业拥有多元的、完善的知识学习机制，企业在学习过程中进行知识整合，不断将其转换为为全球客户创造价值的商业活动(Freeman等, 2010)^[40]。另一方面存续时间长、规模大的企业内部组织冗杂，可能存在的“官僚主义”不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新创企业拥有鼓励创新的内部条件，以此驱动企业开展国际化活动来获取战略性资产。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新创企业的创新需求更强，不断扩张的市场计划迫使其通过知识学习来进行产品的改进和更迭。有进取心的新创企业为了更好地服务全球市场，会通过研发、技术合作等方式进入新市场，以此加速对创新知识的获取、创造和累积(Weerawardena等, 2007)^[30]。

(2)海外社会网络与天生全球化。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指出，企业组织之间相互联系并紧密依存，社会网络对于发现机会、拓展资源至关重要，这些网络中存在的复杂关系可以弥补新创企业国际化经营初始资源的不足，从而触发天生全球化(Zahra, 2005)^[11]。

首先，海外社会网络有助于企业获取东道国真实、有效的信息，减少信息壁垒，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社会网络在提供降低国际活动的固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信息方面十分关键，尤其对于缺乏经验性信息的新创企业，可以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良性互动，从关系网络中识别国际创业机会，并帮助企业获取国际化资源和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Kontinen和Ojala, 2011)^[41]。其次，海外社会网络帮助新创企业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系，提供最初的合作信任。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使东道国的合作方更倾向于与本土企业缔结商业关系，尤其当EMNEs逆向投资时，存在合法性挑战和信息不对称(陈小梅等, 2021)^[42]，而社会网络可以为新创企业“牵线搭桥”，快速获取合作信任，为企业快速进入国际市场创造条件。最后，海外社会网络有助于缩短新创企业的心理距离，以此激励企业快速国际化。根据乌普萨拉模型，心理距离近的国家更容易打破距离阻碍开展经济往来(Johanson和Vahlne, 1977)^[1]。从决策认知来看，面对陌生的市场环境，企业决策表现出有限的分析能力，而社会网络发挥的“圈内人优势”有助于获取隐性的经验知识，降低企业对海外市场的感知风险，帮助建立投资信心。

(3)国际企业家精神与天生全球化。战略选择理论指出，企业战略受到关键决策者个体特质的影响，因此企业家个体特质会影响企业国际化的战略决策(Zahra, 2005)^[11]。本文借鉴McDougall和Oviatt(2000)^[36]的研究，认为国际企业家精神具有创新性、行动前摄性和风险承担性三种特质。

创新性代表了企业家对国际市场机会和国际环境变化采取的开放态度。拥有国际创新性的企业家会在日常经营或战略制定中努力倡导新的方法、观点和价值观，这往往体现在引进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追求新资源或创建新组织上，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含企业制度和管理创新。对于计划开展国际化活动的新创企业来说，国际创新性不仅会促使企业凭借独特产品加入全球竞争，帮助其实现快速成长，而且还会激励企业利用创新活动来开展业务，并引导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中不断变革。

行动前摄性强调重视市场机会，并对动态的市场机会高度敏感，倾向采取先行计划来培养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拥有行动前摄性的企业家善于发挥“首创精神”，其具备的认知能力和组织能

力有利于企业快速、主动地抓住国际市场机会并发掘利用这些机会的新渠道,从而帮助企业克服新企业劣势和外来者劣势(薛求知和周俊,2007)^[15]。大型跨国企业往往需要周密详实的投资计划,而新创企业在组织完备性方面并不具备这一能力,因此新创企业会更加快速地去寻找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并做出超前的战略决策。此外,企业可以提前感知、预测制度风险和合法性劣势,并通过与熟悉特定市场环境的组织进行信息交换来缓解风险。因此,具有行动前摄性的企业会以全球性的战略视野洞察国际经营环境,在开展海外业务前主动寻求降低国际化风险的途径(杨忠等,2007)^[14]。

风险承担性是指敢于冒险和勇于承担高风险,体现于企业家为了寻求高回报而愿意承担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较强的冒险精神会提升企业承担海外经营风险的能力,从而成为新创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动力。Clercq等(2005)^[43]认为,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更倾向于跨国经营,并反映在制定激进的全球市场战略上。相较于扩张国内市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会面临更高的风险,因此,具有较强风险承担能力的新创企业更愿意开展国际化活动。

3.EMNEs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因素组合

EMNEs天生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决策过程。当从不同视角对决策主体解释时,不同主流理论的解释力可能存在差异性 or 相似性,继而使得不同理论解释视角间存在联动关系(赵云辉等,2020)^[44]。根据Zahra(2005)^[11]的研究,年轻企业选择国际化将面临三大劣势。首先是经济规模劣势,这类企业的资金实力较弱、有形资源有限,削弱了面对风险的能力。其次是外来者劣势,海外企业对东道国制度、法律等缺乏充分了解,面临合法性障碍。最后是新企业劣势,由于成立时间较短,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有限,制约了国际化发展的速度(薛求知和周俊,2007)^[15]。而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可能存在联合效应,继而帮助EMNEs克服上述劣势并实现天生全球化。前期相关研究为考察每一种因素对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影响提供了依据,但基于变量导向的方法无法处理多条件相互依赖的耦合效应、组态的等效效应和因果非对称性等复杂的问题,本文尝试从组态视角出发厘清EMNEs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因素组合。

(1)创新优势与海外社会网络的联动。企业在制定战略决策的过程中,创新优势是企业资源,而根植于海外社会网络是一种战略选择,新创企业可以利用网络实现内外部的有效连接,高效整合内部资源,继而降低“走出去”的风险。例如,在走向国际市场时,新创企业需要提供有价值的、创新性的产品才有可能被新市场所接纳,而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巨大差异,企业需要借助关系网络来提升进入新市场的合法性,以此弥补年轻企业的外来者劣势和新企业劣势,这恰好表明企业天生全球化的驱动机制包括创新优势和海外社会网络。创新优势是企业利用海外社会网络的基础,只有具备了获取知识的动机和能力,企业才可能有效利用社会网络。此外,两者之间还可能存在互补性,海外社会网络弥补了新创企业社会资源不足的劣势,企业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来获取互补性资产。

(2)国际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优势的联动。在缺乏海外社会网络的情况下,往往需要国际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创新活动过程中发挥能动作用。例如,为了获取战略性资产,具有行动先行性的新创企业利用创新资源快速开展国际活动,并在国际化过程中拓展网络关系,此时驱动天生全球化的机制包括国际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优势。此外,根据交易成本理论,拥有无形资源的新创企业在寻求海外市场时,更可能通过高控制型的方式进入海外市场,尽管高股权的并购方式承担着较大的投资失败风险,但也保持了对这些价值性资产的控制,防止隐性知识的泄露(吴先明,2017)^[45],此时创新优势与国际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天生全球化过程中相伴而生。

(3)海外社会网络与国际企业家精神的联动。由于新创企业存在新企业劣势,企业与海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可能需要通过海外社会网络来实现,海外社会网络通过信任来规范企业行为,从

而为企业管理者发挥国际企业家精神提供保障。一方面,具有行为前瞻性的企业家通过海外社会网络来获取东道国合作方的信任,帮助企业克服新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另一方面,海外社会网络有助于企业家发现海外的创业机会和创新渠道,可以催生出国际企业家精神(薛求知和周俊,2007)^[15]。此外,鉴于网络可以缩短心理距离,海外社会网络还可能会改变企业家对进入海外市场的风险认知,增强投资信心,使企业家以一种更加积极与激进的心态去面对企业的国际化战略。以上均体现出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的联动是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驱动机制。

除了上述描述的三种情境之外,由于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与国际企业家精神对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作用存在差异性,使得相关因素可能存在叠加效应,即三者同时为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因素。接下来,本文将引入 QCA 方法,探索上述理论解释对企业天生全球化的联合效应,并揭示不同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本文的逻辑框架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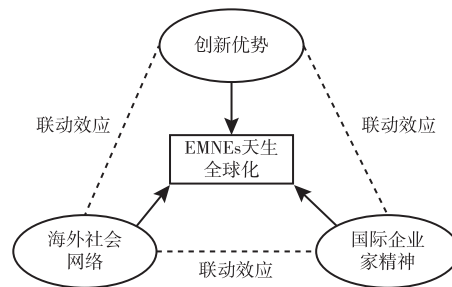


图 1 EMNEs 天生全球化驱动因素组合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研究设计

1. QCA 方法的适用性

本文运用以集合论为基础的 QCA 方法来分析 EMNEs 天生全球化背后的逻辑机制。原因如下:第一, QCA 方法强调“多因共果”,这与本文认为企业天生全球化取决于多重因素的观点一致。然而,权变视角下的传统计量模型考虑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等因素独立作用或两两因素交互作用的常态分析无法完全揭示天生全球化研究中变量之间“多重并发”的因果关系(Fainshmidt 等,2020)^[46]。运用 QCA 方法破解了只能采取单项因果假定的困境,从组态视角理解 EMNEs 在不同情境下选择天生全球化的缘由,拓展了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理论解释维度。第二,传统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并不是完全的等效关系,而 QCA 方法认可不同前因条件组态对被解释结果有互不冲突的完全等效性(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47]。EMNEs 国际化战略往往具有多重原因和目的,可能存在多条“等效”因果链。因此,利用 QCA 方法来讨论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因素和路径,可以帮助本文探索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不同模式,并找出不同前因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

2. 数据来源

本文的基础数据源是国泰安(CSMAR)数据库,该数据库统计了中国上市企业 OFDI 的相关数据(赵云辉等,2020)^[44]。参考 Oviatt 和 McDougall(1997)^[5],本文将企业年龄在 6 年以上、并在成立最初的 6 年内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认定为天生全球化企业。本文与 Vanninen 等(2017)^[38]的观点类似,认为一家企业在其首次对外直接投资时就成为跨国企业,这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开端。

本文提取出中国 A 股上市企业首次 OFDI 的事件,并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国际化经营当年企

业为ST或PT或*ST的样本;(2)剔除东道国为“避税天堂”的样本以及投资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样本^①;(3)剔除行业为金融业的样本;(4)剔除上市企业在海外设立的子公司因注销、出售、撤资和转让等原因退出的样本;(5)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考虑样本的可比性,本文还剔除了不存在天生全球化企业的年份^②。遵循上述样本筛选原则获得2008—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178起对外直接投资事件的样本^③,其中,企业天生全球化事件有72起。

3. 变量测量

(1)结果变量。是否为天生全球化企业(BG)。将样本企业中成立6年内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识别为天生全球化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

(2)前因条件。创新优势。本文在创新优势下设置三个前因条件,分别是创新成果导向、天生创新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创新成果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体现了企业对创新技术的追求,但开展创新活动的目的存在差异,前者表示创新活动的目的是创造出新产品和研发新技术,后者更强调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过程中的知识学习。天生创新导向表明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企业更倾向于天生全球化。上述条件均在不同角度体现了企业是否具备独特的创新优势。结合企业的国际化活动,对变量的衡量如下:①创新成果导向(Patent):企业是否申请专利,如果企业当年申请专利,取值为1,否则为0,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如果企业存在申请专利行为,那么认为该企业拥有浓厚的创新文化,期望利用国际化来开发新产品。②天生创新导向(RDratio):企业的研发能力,根据企业当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如果研发投入更多,那么认为企业自身的创新资源越多、创新能力更强。③创新过程导向(Business):企业是否具有海外技术开发业务,根据企业当年开展海外业务的商业信息进行判定,如果商业业务范围中含有技术开发活动,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企业首次OFDI的业务是开展海外技术开发活动,那么这些企业往往已经具备一定的创新资源,并想要在国际化过程中积累创新知识。

海外社会网络。作为社会网络的典型代表,海外社会网络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弥补新创企业的竞争劣势,从而实现快速国际化。社会关系网络根据联结强度可以分为弱关系和强关系。强关系是指行动者彼此之间具有亲密的关联和频繁的互动(Granovette, 1973)^[48]。在关系社会资本的框架下,强关系侧重于天生通过血缘、亲属关系等人际社交嵌入社会网络,是一种天生存在于决策者基因中的资源,能够提供物质与情感的支持,该网络中的关系具有亲密且稳定的特征,往往充当“人情网”的作用,有助于企业缩小与特定市场的心理距离。弱关系是指联系较弱的人际关系纽带,突出特征为互动次数少、亲密程度低、互惠交换少且窄。普通朋友、同学、校友和同事就是典型的弱关系网络。弱关系代表着关系网络范围广、异质性强,有利于企业拓宽信息来源,识别全球经营的机遇,从而加快企业的国际化速度。本文主要以管理团队,即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简称:董监高)的关系网络来衡量海外社会网络:④弱关系网络(Background):如果该企业当年董监高成员中拥有海外经历,取值为1,否则为0,这里的海外经历指的是曾经在海外任职或者海外求学。拥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管理者,不仅广泛接触了海外的社会资源,同时也嵌入了华人移民网络,交往面广、网络的异质性强,但多数关系并不紧密,也缺乏维系强烈感情的动力。因此如果企业董监高团队中存在拥有海外经历的人员,那么认为该企业具有弱关系网络。⑤强关系网络(Nationality):如果该企业当年董监高成员中存在外籍成员,取值为1,否则为0。基因的偏好使网络中人与人的关系紧密、互动频率高,更容易产生信任和感情基础上的互利互助,在该网络中获得

① 企业向“避税天堂”投资的可能原因是利用转移定价降低企业税负,而非真正地开展国际化活动;而中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存在天生的亲缘关系和制度纽带,如果不剔除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有偏。

② 为了尽可能地提升样本企业的可比性,如果该年份不存在天生全球化企业,本文做剔除处理。

③ 没有考虑2008年之前的样本,是因为数据库中董事长、监事会成员和高管成员的背景信息从2008年开始统计。

的信息也相对稳定和可靠。因此,如果企业董监高团队中存在外籍人员,那么认为该企业具有强关系网络。

国际企业家精神。参照 McDougall 和 Oviatt(2000)^[36]的研究,从创新性、行动前摄性和风险承担性三个方面来考察国际企业家精神。相关文献表明,创新性对企业天生全球化的主要作用是鼓励企业培育、利用创新资源和能力,例如倡导新方法、激励研发产品和加大研发投入等,其本质仍是建立创新优势。鉴于前文已经从不同视角衡量了企业的创新优势,因此本文从其他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国际企业家精神:⑥行动前摄性(*OFDIarea*):企业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的广度,如果企业投资多个东道国,取值为1,否则为0。具有行动前摄性的企业会主动识别市场机遇、寻求新市场和拓展业务范围,对于开展国际业务的企业通常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广度上(Clercq等,2005)^[43]。因此,当企业首次OFDI时选择多个东道国,则认为企业的行动前摄性更高。⑦风险承担性(*TotalOFDI*):企业当年完全跨境并购的项目数量。风险承担能力更强的企业在战略决策上更加激进,更能承担国际竞争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具体到参与OFDI的企业,由于逆向选择风险和高额评估成本,企业可能会倡导渐进式的部分并购,激进式的完全并购成了OFDI企业具有“高风险承担性”的代名词(张明等,2019)^[17]。因此,如果企业首次OFDI选择完全并购的海外关联交易次数越多,那么认为企业的风险承担性更高。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天生全球化企业拥有追求创新的特质和丰富的创新资源,企业具有明显的海外社会网络优势,并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前摄性和风险承担性。

表1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天生全球化企业					非天生全球化企业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创新优势	创新成果导向	<i>Patent</i>	72	0.6677	0.4747	0	1	106	0.6604	0.4758	0	1
	天生创新导向	<i>RDratio</i>	72	5.6885	6.8644	0.0100	41.0723	106	4.0792	2.3664	0.0100	11.7180
	创新过程导向	<i>Business</i>	72	0.2361	0.4277	0	1	106	0.0660	0.2495	0	1
海外社会网络	弱关系网络	<i>Background</i>	72	0.6944	0.4639	0	1	106	0.6038	0.4914	0	1
	强关系网络	<i>Nationality</i>	72	0.3056	0.4639	0	1	106	0.1981	0.4005	0	1
国际企业家精神	行动前摄性	<i>OFDIarea</i>	72	0.2222	0.4187	0	1	106	0.1981	0.4005	0	1
	风险承担性	<i>TotalOFDI</i>	72	2.5139	3.9325	0	31	106	2.1415	2.4821	0	14

4. 变量校准

前因变量中,*RDratio*和*TotalOFDI*为定序变量,因此,本文借鉴 Papamitsiou等(2020)^[49]的做法,将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门槛值依次为相应数据在80%、50%及20%分位数上的数值,运用 Calibrate 函数将*RDratio*、*TotalOFDI*校准为0~1之间的模糊得分^①。其余变量均为0/1变量,完全隶属取值为1,完全不隶属取值为0。相关变量的数据来源和校准值如表2所示。

表2 相关变量的校准值

条件和结果	数据来源	校准
<i>BG</i>	CSMAR 数据库	清晰集,1=天生全球化企业,0=非天生全球化企业
<i>Patent</i>	CNRDS 数据库	清晰集,1=申请专利,0=没有申请专利
<i>RDratio</i>	CNRDS 数据库	直接校准法,校准点:80%、50%和20%分位数(5.69,4.05,0.52)
<i>Business</i>	CSMAR 数据库	清晰集,1=存在技术开发业务,0=不存在技术开发业务

① 当校准后的值为0.5时,运用QCA分析时会将该条样本剔除。为了避免样本在分析时的遗漏,当校准后结果为0.5时,按照现有文献惯常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加0.001。

续表 2

条件和结果	数据来源	校准
<i>Background</i>	CSMAR 数据库	清晰集,1=董监高成员拥有海外经历,0=董监高成员无海外经历
<i>Nationality</i>	CSMAR 数据库	清晰集,1=董监高成员拥有外籍人员,0=董监高成员无外籍人员
<i>OFDIarea</i>	CSMAR 数据库	清晰集,1=投资多个东道国,0=投资一个东道国
<i>TotalOFDI</i>	CSMAR 数据库	直接校准法,校准点:80%、50%和20%分位数(3、1、0)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1. 单要素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

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各个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Ragin和Fiss,2008)^[50]。利用fsQCA3.0软件对天生全球化必要条件进行检验的数据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所有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说明不存在驱动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该结果也表明,EMNEs天生全球化的形成原因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需要进一步借助组态分析判断不同因素组合的影响。

表 3 单要素前因条件必要性分析

前因条件	天生全球化企业		前因条件	天生全球化企业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i>Patent</i>	0.6667	0.4068	<i>~Patent</i>	0.3333	0.4000
<i>RDratio</i>	0.5079	0.4242	<i>~RDratio</i>	0.4921	0.3860
<i>Business</i>	0.2361	0.7083	<i>~Business</i>	0.7639	0.3571
<i>Background</i>	0.6944	0.4386	<i>~Background</i>	0.3056	0.3438
<i>Nationality</i>	0.3056	0.5116	<i>~Nationality</i>	0.6944	0.3704
<i>OFDIarea</i>	0.2222	0.4324	<i>~OFDIarea</i>	0.7778	0.3972
<i>TotalOFDI</i>	0.6542	0.4141	<i>~TotalOFDI</i>	0.3458	0.3875

注:“~”表示非(集),相关变量缺席

2. 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参考Schneider和Wagemann(2012)^[51]的做法,本文将组态分析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5,根据样本总数将频数阈值设定为1。表4为七个前因条件形成的组态对企业天生全球化的分析结果。本文主要汇报中间解,辅之简约解,结果按照Ragin和Fiss(2008)^[50]的符号表达形式呈现。

表 4 企业天生全球化的组态

前因条件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创新优势	<i>Patent</i>	●	⊗	●	●	⊗
	<i>RDratio</i>	●	●	⊗	⊗	●
	<i>Business</i>	·	●	●	●	●
海外社会网络	<i>Background</i>	⊗	·	●	●	⊗
	<i>Nationality</i>	●	·		⊗	·
国际企业家精神	<i>OFDIarea</i>	⊗	⊗	⊗	·	·
	<i>TotalOFDI</i>	·	·	·	·	·
一致性	1	1	0.9554	1	1	1
原始覆盖率	0.0231	0.0315	0.0208	0.0183	0.0138	0.0139
净覆盖率	0.0231	0.0315	0.0139	0.0114	0.0138	0.0139
总体一致性	0.9916					
总体覆盖率	0.1145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辅助条件存在,⊗表示辅助条件缺失,“空格”表示该条件可存在或者不存在,下同

如表 4 所示,七个前因条件对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影响呈现出六种组态,每个单一组态的一致性水平和总体一致性水平均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5)。总体解的覆盖率为 0.1145,表明该结果可以作为解释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证据(赵云辉等,2020)^[44]。综上,上述六个组态可以视为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充分条件组合。

组态 1 中,创新优势的三个前因条件都存在,意味着创新优势是新创企业天生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组态 2 中, *RDratio* 和 *Business* 为核心条件存在, *Background*, *Nationality* 和 *TotalOFDI* 为辅助条件存在。该组态表明,在拥有海外社会网络的情况下,具有创新优势的新创企业更有可能实现天生全球化,即呈现出“网络驱动+创新驱动”的联合特征。组态 3 和组态 4 类似, *Patent*, *Business* 和 *Background* 为核心条件存在,表明具有创新优势的新创企业,当拥有弱关系网络时更可能实现天生全球化,创新优势和弱关系网络的联合是决定企业是否天生全球化的关键因素。组态 5 中, *RDratio* 和 *Business* 为核心条件存在, *Nationality*, *OFDIarea* 和 *TotalOFDI* 为辅助条件存在,意味着具有创新优势的新创企业,当具备国际企业家精神特征时更可能实现天生全球化,国际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优势的共同驱动是导致企业成为天生全球化企业的重要因素。组态 6 中, *Patent*, *RDratio* 和 *Nationality* 为核心条件存在, *OFDIarea* 和 *TotalOFDI* 为辅助条件存在。这表明,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同时是 EMNEs 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因素。

从单个条件(横向)看,每一个组态中创新优势下的前因条件都会以核心条件出现,说明创新优势驱动对企业天生全球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及联合效应。同时, *TotalOFDI* 在所有组态中均作为辅助条件存在的前因条件,说明风险承担性对企业天生全球化是重要的。针对上述复杂的关系,本文将在“EMNEs 天生全球化路径的四种模式”部分进行深度诠释。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使用调整一致性阈值和调整校准阈值来进行稳健性检验(Schneider 和 Wagemann, 2012)^[51]。首先,将一致性水平下调至 0.78(张明等,2019^[17];赵云辉等,2020^[44]),其余设定与前文一致。表 5 的检验结果显示,改变一致性阈值后,各组态及整体解的一致性和覆盖率为表 4 一致。其次,使用 90% 和 10% 作为完全隶属和完全不隶属阈值,其余设定与前文相同,结果如表 6 所示。综合比较表 6 和表 4 的结果可以发现,六种组态形成的前因条件组合一致,虽然总体解的一致性和覆盖率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是稳健的。

表 5 改变一致性水平的稳健性检验

前因条件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创新优势	<i>Patent</i>	●	⊗	●	●	⊗	●
	<i>RDratio</i>	●	●	⊗	⊗	●	●
	<i>Business</i>	·	●	●	●	●	⊗
海外社会网络	<i>Background</i>	⊗	·	●	●	⊗	⊗
	<i>Nationality</i>	●	·		⊗	·	●
国际企业家精神	<i>OFDIarea</i>	⊗	⊗	⊗		·	·
	<i>TotalOFDI</i>	·	·	·	·	·	·
一致性		1	1	0.9554	1	1	1
原始覆盖率		0.0231	0.0315	0.0208	0.0183	0.0138	0.0139
净覆盖率		0.0231	0.0315	0.0139	0.0114	0.0138	0.0139
总体一致性		0.9916					
总体覆盖率		0.1145					

表 6 改变校准阈值的稳健性检验

前因条件		组态 1	组态 2	组态 3	组态 4	组态 5	组态 6
创新优势	<i>Patent</i>	●	⊗	●	●	⊗	●
	<i>RDratio</i>	●	●	⊗	⊗	●	●
	<i>Business</i>	·	●	●	●	●	⊗
海外社会网络	<i>Background</i>	⊗	·	●	●	⊗	⊗
	<i>Nationality</i>	●	·		⊗	·	●
国际企业家精神	<i>OFDIarea</i>	⊗	⊗	⊗		·	·
	<i>TotalOFDI</i>	·	·	·	·	·	·
一致性		1	1	0.8427	0.9594	1	1
原始覆盖率		0.0219	0.0275	0.0208	0.0164	0.0125	0.0132
净覆盖率		0.0219	0.0275	0.0139	0.0094	0.0125	0.0132
总体一致性				0.9644			
总体覆盖率				0.1054			

五、EMNEs 天生全球化路径的四种模式

QCA 方法有效地识别了引发企业天生全球化的路径,揭示了 EMNEs 选择天生全球化战略的驱动因素具有“殊途同归”与“多重并发”的特征。根据各个路径包含的核心/辅助条件和背后的解释逻辑,本文将之归纳为四种模式,分别是独特创新优势驱动的探索型天生全球化、网络叠加创新驱动的根植型天生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叠加创新活动驱动的冒险型天生全球化和混合因素驱动的追赶型天生全球化,每种模式下呈现出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联合效应的不同组合特征。

1. 模式一:独特创新优势驱动的探索型天生全球化

组态 1 涵盖了创新优势下的所有前因条件,较好地呈现出 EMNEs 天生全球化中的“创新”驱动的重要性。该模式的特征为:对新技术的追求激发了企业配置研发要素的积极性,充裕的创新资源加速了企业对创新知识的获取并期望通过国际化塑造企业的创新优势,由此建立核心竞争力、快速扩张全球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创新优势驱动”特征。在实践中,此模式下所描述的创新优势驱动与“跳板视角”指出的 EMNEs 对发达经济体的探索型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较为吻合(Luo 和 Tung, 2007)^[52]。相比于大型跨国企业,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新创企业缺乏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本,但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的全球战略,获取知识和掌握先进技术,企业会高效地利用已有的无形资源在开展国际化过程中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技术合作关系,以此弥补缺乏海外社会资源的劣势。永太科技的国际化进程就是与组态 1 相匹配的典型案列。永太科技是中国首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先进技术的开发团队和企业研发机构。企业在成立后快速进军海外市场,在美国“药谷”新泽西成立美国子公司 YoungTech 开展仿制药研发业务,启动美国技术中心建设,并着手打造自主制剂研发注册平台以支持企业外向型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命题 1:拥有独特创新优势情境下,EMNEs 会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开展国际创新活动和进行技术探索,此时 EMNEs 的天生全球化具有创新驱动下的探索型特征。

2. 模式二:网络叠加创新驱动的根植型天生全球化

组态 2、组态 3 和组态 4 较好地呈现出 EMNEs 天生全球化中的创新优势和海外社会网络的联合效应。组态 2 的特征为:在创新优势方面,核心存在条件为 *RDratio* 和 *Business*,使得组态 2 呈现出创新驱动的特征。海外社会网络方面,*Background* 与 *Nationality* 为辅助条件存在,表明海外社会网

络也是企业天生全球化的驱动力。组态 3 和组态 4 的特征类似,创新优势和海外社会网络同时为核心存在条件,具体的前因条件是 *Patent*、*Business* 和 *Background*。因此,整体而言,上述三个组态均凸显了 EMNEs 天生全球化中的网络驱动并伴有创新驱动的叠加效应,同时,国际企业家精神相对缺失,且创新优势的前因条件之间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挤占效应。与模式一相比,这一驱动模式强调创新优势与海外社会网络之间的交互作用,意味着具备创新优势的企业能够敏锐地发现国际上的新技术趋势和某些地区的市场偏好,并利用已有的海外社会网络获取广泛、有效的信息来开发新市场,使企业的国际化活动深深根植于东道国的社会关系之中。该模式与 LLL (linkage-leverage-learning) 框架中理解 EMNEs 进行 OFDI 较为相似:EMNEs 作为全球市场的追赶者,强调进行海外扩张以建立其优势,利用杠杆作用提升跨国企业管理和利用国际网络的能力,并通过联动和杠杆的过程,实现有效的学习。与 OLI 框架等传统 OFDI 理论相比,LLL 框架侧重于国际化的动态过程,并强调外部资源对组织内部资源的重要作用(Mathews, 2006)^[53]。实践中,在开拓国际市场时,根植型 EMNEs 必须具备整合创新资源的能力,能够提供创新技术或者独特的产品,才可能被海外客户接纳。同时,在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利用社会网络来获取经验性信息、制度知识和互补性资产。模式二的典型案例是拓日新能。该企业是中国首家 A 股上市的纯太阳能企业,成立之初就积极整合国际市场的创新资源,并加大对欧美地区传统市场的开发力度,积极布局光伏产品的海外销售计划。企业董监高团队的背景呈现多元化特征,数位高管曾在海外求学,在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积极发挥了“桥”的作用,帮助企业快速实现国际化并占有海外市场份额。

值得关注的是,组态 2 与组态 3、组态 4 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在创新优势方面,*Business* 在三组组态中均为核心条件存在,而 *Patent* 和 *RDratio* 则表现出明显的挤占效应。组态 2 中,充足的创新资金弥补了企业对创新成果的短期追求,这与实践中中国 MNEs 的创新效应具有滞后性或者长期效应一致,更强调 EMNEs 国际投资中的“学习效应”(毛其淋和许家云,2014)^[54]。组态 3 和组态 4 中,追求创新成果和积极开展研发业务弥补了研发投入不足的劣势,意味着在该类模式下,企业的海外创新活动以增加创新产出和获取创新知识为导向,更强调 EMNEs 国际投资发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需要强调的是,*Patent* 和 *RDratio* 存在挤占效应的前提是国际企业家精神的缺失,这是因为两者在弥补新创企业国际企业家精神不足上的作用是相似的。企业追求新产品符合 McDougall 和 Oviatt (2000)^[36] 对国际企业家精神下创新性的描述,而拥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会降低对国际企业家精神的依赖,富余的研发资金有助于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海外社会网络方面,组态 2 中,*Background* 与 *Nationality* 同时存在,并作为辅助条件,表明“学习导向”的企业倾向于利用海外社会网络来缔结研发合作和开展海外研发活动。与之不同的是,组态 3 和组态 4 中,*Background* 为核心条件存在。强关系网络的建立以血缘、情感为纽带,所获取的知识重复性较高,而弱关系网络在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中建立,能带来的信息、资源更具有异质性和广泛性,它比强关系网络更能跨越组织边界去获取知识和低成本资源,从而帮助企业实现快速的创新产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命题 2: 国际企业家精神较弱情境下,EMNEs 的天生全球化具有网络驱动和创新驱动组合的根植型特征。

命题 2a: 国际企业家精神较弱情境下,具有“学习导向”的 EMNEs 的天生全球化具有网络驱动和天生创新驱动组合特征。

命题 2b: 国际企业家精神较弱情境下,具有“逆向技术溢出导向”的 EMNEs 的天生全球化具有弱关系网络和创新结果驱动组合特征。

命题 2c: 国际企业家精神较弱情境下,创新成果导向和天生创新导向对具有海外研发业务的

EMNEs的天生全球化产生挤占效应。

3. 模式三:企业家精神叠加创新活动驱动的冒险型天生全球化

组态5中,创新优势中“天生创新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特征较为突出,表明该类企业通过投入研发资源积极开展创新活动,而国际企业家精神下的条件变量存在均作为辅助条件。这一模式表现为突出的创新投入与过程驱动特征,并伴有国际企业家精神的叠加效应。国际企业家精神在EMNEs创新资源配置中发挥能动作用,行动前摄性影响企业创新资源配置的方式和积累的方向(例如,在哪个东道国开展技术开发活动),而风险承担性决定企业开展国际活动的模式(例如,完全并购或者不完全并购),从而与企业的创新优势产生联动效应。此外,条件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特征,较强的国际企业家精神弥补了海外社会网络缺失的不足。富有国际企业家精神的企业会以全球性的战略视野洞察经营环境,在拓展海外市场时主动积极缔结网络关系,继而有效克服业务的不确定性。同时,国际企业家精神还有效弥补了创新成果导向的缺失。这类企业的管理层富有冒险精神,在寻求海外市场机会的过程中,他们敢于尝试,并具有大胆、激进的研发策略和投资战略。敢于做领导者而不是跟随者的魄力与自信,使得这类企业并不重点关注创新产出,而更聚焦于创新过程中知识储备的积累。模式三的典型案例是盈趣科技。盈趣科技自成立初期就积极开展国际化,短期内相继在马来西亚、加拿大、匈牙利、英国等国家(地区)绿地新建海外子公司,并收购瑞士SDATAWAY SA及SDH Holding SA等企业,因此,国际企业家精神驱动其天生全球化。盈趣科技以自主创新的智能制造模式为基础,积极开展海外技术开发业务,具有较强的创新优势。此外,企业家精神叠加创新活动驱动的模式有助于帮助企业快速缔结网络关系,目前,盈趣科技已与Logitech、Nestlé、3Dconnexion、Bosch和Asetek等国际知名科技型企业建立起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命题3:海外社会网络较弱和创新成果导向不足情境下,EMNEs的天生全球化具有国际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投入与过程驱动组合的冒险性特征。

4. 模式四:混合因素驱动的追赶型天生全球化

组态6较好地呈现出EMNEs天生全球化的多因素联合驱动。此模式的特征为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下的前因变量存在均为核心或辅助条件。具体来说,在创新优势方面,基于创新优势的创新成果导向和天生创新导向特征较为突出,*Patent*和*RDRatio*之间存在叠加效应。在海外社会网络方面,*Nationality*为核心条件存在,但*Background*缺失为核心条件,说明海外社会网络下的前因条件之间存在挤出效应。国际企业家精神方面,*OFDIarea*和*TotalOFDI*为辅助条件存在。模式四下,新创企业对开发新产品的追求使企业投入大量的研发资金开展国际化活动,期望获取先进核心技术,但也伴随着海外经营的合法性风险,此时强关系网络可以很好地发挥“圈内人优势”,帮助企业降低国际经营风险(Evers和O’Gorman,2011)^[55]。在兼备创新优势和海外社会网络的情况下,企业家还要利用他们高超的领导力和决策力来杠杆化地利用资源。因此,具有国际企业家精神的新创企业的管理者能更高效地整合资源,发现其他竞争者不能发现的市场盈利点,并通过企业战略去现实。信维通信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为了支持企业的供应链布局,信维通信自成立起就积极在美国、瑞士、瑞典等国家(地区)开展海外技术开发业务,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灵活的创新能力。企业的董监高团队中有数名成员曾在外资企业工作并担任重要管理层职务,具有“网络驱动”特征。此外,信维通信海外扩张速度快,具有较强的国际企业家精神。企业以2012年收购世界知名天线厂商英资莱尔德为契机,开启了国际化战略布局。截至目前,企业的业务版图已遍布7个国家15个地区,完成了全球多个分部的建设。基于前述分析,本文提出:

命题4:追求创新成果情境下,EMNEs天生全球化具有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混合驱动组合的追赶型特征。

5. 进一步讨论

通过进一步对六个组态的前因条件组合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发现,组态1~组态6中,创新优势下的前因条件均以不同组合形式同时存在,且均作为核心条件。由此可见,在不同情境下,*Patent*、*RDratio*和*Business*之间具有叠加效应。天生创新导向是EMNEs内生的创新驱动力量。Knight和Cavusgil(2004)^[3]指出,天生全球化企业自成立起就具备创新能力和国际创业导向的特质。相比之下,创新成果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是EMNEs后天的、主动的创新行为。重视获取新技术是新创企业的自然惯例,创业精神源于企业通过创新利用资源和改变现有市场的能力,这种基本的创新精神产生了新的想法和创造过程,从而驱使EMNEs寻求新技术。在企业汲取创新过程中,发展出来的知识提供了新技术开发所需的能力,并成为EMNEs天生全球化过程中克服当地企业所享有的本土优势的关键资源。具体地,组态2和组态5中,*RDratio*和*Business*均作为核心存在条件,凸显拥有研发业务的新创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会投入大量的创新资源,不断增强创新能力,进而会对天生全球化产生叠加效应。组态3和组态4中,*Patent*和*Business*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出于技术寻求的“出海”目的,EMNEs具有较强的技术成果转化动力,期望在研发活动中获取技术溢出,因而拥有明显的“创新成果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特征。组态1和组态6中,*Patent*和*RDratio*均作为核心条件存在,逆梯度OFDI是EMNEs寻求战略资产、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企业利用强关系网络增强了技术“出海”的信心,提升了跨国技术合作的信任,因此,EMNEs投入研发要素进行探索型OFDI以获取战略性资产,进而呈现出“创新成果导向”和“天生创新导向”的叠加效应。

在海外社会网络的前因条件方面,除了组态2,其余组态中,*Background*和*Nationality*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挤占效应。其中,组态1和组态6中,*Nationality*为核心条件存在,而*Background*缺失为核心条件;组态3和组态4中,*Background*为核心条件存在,*Nationality*缺失为辅助条件或无关紧要的条件;组态5中,*Nationality*为辅助条件存在,*Background*缺失为辅助条件。上述结果表明,*Background*和*Nationality*都可以为企业带来关系资源,帮助新创企业降低进入国际市场的风险。弱关系网络和强关系网络都属于典型的海外社会网络,两者均能促进EMNEs天生全球化,但在发挥作用方面存在差异。弱关系网络是获得非冗余新信息的有效途径,在群体中更能充分发挥“信息桥”的作用,企业可以利用弱关系网络识别更多的国际创业机会(Kontinen和Ojala,2011)^[41]。董监高团队的海外背景代表企业管理者具备一定的海外视野,有利于企业发现国际市场中的新机遇。海外的求学、工作经历使得管理层的关系网络范围广且异质性强,有助于获取多样化的国际化渠道、知识和资源,从而加速企业的国际化进程。而强关系网络更具有“圈内人优势”,主要体现在提供可靠的信息和合作信任方面,帮助企业与海外利益相关者搭建最初的信赖和互惠,增强新创企业“走出去”的信心(Granovetter,1973^[48];Evers和O’Gorman,2011^[55])。此外,血缘的亲密性和稳定性意味着彼此的文化距离、心理距离更近,有助于降低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协调成本。观察上述组态,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Background*与*Patent*、*Business*具有联动效应,而*Nationality*与*RDratio*具有联动效应,这也印证了上文的分析,即弱关系网络有助于企业捕捉国际市场的机会,激励其积极参与全球研发活动。网络的异质性可以有效地帮助企业获取广泛的知识信息,从而在研发过程中实现快速的创新产出。然而,对于创新能力突出的企业,更重视研发创新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强关系网络带来的可靠信息和成本优势更容易成为其快速国际化的推动力量。另外,复杂创新知识的流动在需要面对面、频繁交流的知识共享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强关系网络恰好有利于提高这种知识和信息传递的效率。因此,基于前述分析,本文提出:

命题5:创新优势下,创新成果导向、天生创新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两两之间对EMNEs天生全球化产生叠加效应。

命题6:海外社会网络下,弱关系网络和强关系网络对EMNEs天生全球化产生挤占效应。

为了方便理解和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对组态类型进行了总结,包括模式类型、组态视图、驱动策略和典型案例,如表7所示。

表7 EMNEs天生全球化模式类型和组态视图

模式类型	组态视图	驱动策略	典型案例
独特创新优势驱动的探索型天生全球化		被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所驱动,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开展国际创新活动,具有创新优势驱动下的探索型特征。	永太科技在美国药谷新泽西成立子公司
网络叠加创新驱动的根植型天生全球化		具备创新优势的企业能够敏锐地发现新技术的趋势,并利用已有的海外社会网络获取有效的信息来开发新市场,具有网络驱动和创新驱动组合的根植型特征。	拓日新能加大对欧美海外市场的开发力度
企业家精神叠加创新活动驱动的冒险型天生全球化		以全球性的战略视野洞察国际经营环境,积极配置创新资源,具有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投入与过程驱动组合的冒险型特征。	盈趣科技收购瑞士企业和相继绿地新建多家海外子公司
混合因素驱动的追赶型天生全球化		兼备创新优势和社会网络的情况下,企业家利用企业家精神来利用、开发已有竞争优势和海外社会网络,具有多要素混合驱动组合的追赶型特征。	信维通信积极开展海外技术开发业务和拓展海外业务版图

注:组态视图中实线代表与之相关条件存在(核心条件存在或辅助条件存在);虚线代表与之相关条件缺失(核心条件缺失或辅助条件缺失);阴影圈代表与之相关的部分条件存在(核心条件存在或辅助条件存在);圆圈连接处的实线表示因素之间具有联动效应,虚线表示因素之间不具有联动效应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1. 研究结论与理论贡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以中国跨国企业为代表的EMNEs成功进军国际市场,成为提升新兴经济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年轻企业在成立初期就成功国际化,这与乌普萨拉模型所提倡的渐进式相违背,该现象引发学术界热议。然而,现有文献对EMNEs天生全球化的路径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加之现有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大多基于单一视角,无法完全深入揭示推动EMNEs天生全球化的真实原因。基于此,本文基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从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三个视角出发,对EMNEs天生全球化的缘由进行理论阐述,

并运用QCA方法,以2008—2019年178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例,考察创新成果导向、天生创新导向、创新过程导向、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行动前摄性和风险承担性七个前因条件对EMNEs天生全球化的“联合效应”,以探索其背后的驱动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EMNEs天生全球化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点。一方面,天生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呈现多重并发特征;另一方面,多因素之间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路径,即表现殊途同归现象。研究结果表明,推动EMNEs天生全球化有六个不同却等效的组态。

第二,基于组态结果总结了EMNEs天生全球化路径的四种模式,分别为独特创新优势驱动的探索型天生全球化、网络叠加创新驱动的根植型天生全球化、企业家精神叠加创新活动驱动的冒险型天生全球化和混合因素驱动的追赶型天生全球化。模式一中,创新成果导向、天生创新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共同组合而成的独特创新优势是推动企业天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说明创新优势有利于知识的获取、创造和累积,从而为新创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提供优势。模式二、模式三和模式四是同时具备不同视角下多因素的驱动模式。模式二中,新创企业具备海外社会网络和创新优势可以弥补国际企业家精神较弱的缺陷;模式三中,新创企业具备行动前摄性、风险承担性和创新优势下的创新过程驱动可以抵消海外社会网络较弱和创新成果导向不足的情境;模式四中,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混合驱动了新创企业天生全球化。

第三,EMNEs天生全球化的前因条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创新优势方面,在不同的模式下,创新成果导向、天生创新导向和创新过程导向之间产生叠加或挤占效应。海外社会网络方面,鉴于弱关系网络发挥信息优势而强关系网络发挥“圈内人优势”的区别,弱关系网络和强关系网络之间存在挤占效应。

本文主要有以下理论贡献:首先,从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理论和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多视角出发,通过整合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多维企业微观因素,探索多要素组合对EMNEs天生全球化的驱动机制。不同于以往基于AMNEs的天生全球化理论框架(Choquette等,2017)^[56],本文发现EMNEs需要耦合异质性资源来克服外来者劣势和新企业劣势。尽管已有学者建立了综合视角下EMNEs天生全球化的分析框架(薛求知和周俊,2007)^[15],但仍停留在理论层面,本文利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验证了需要基于多理论视角来看待和解释EMNEs天生全球化的现象,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其次,本文为EMNEs天生全球化的路径提供更丰富的证据。EMNEs快速国际化的关键在于企业是否具有资源禀赋优势和动态的学习能力(Pereira等,2022)^[57],本文基于“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国际企业家精神”的耦合框架,发现单一要素并不能成功驱动企业天生全球化,不同要素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归纳出不同条件组合下EMNEs天生全球化路径的四种模式。该结论破解了传统单一视角无法充分解释EMNEs天生全球化现象的困境,也进一步细化了EMNEs天生全球化整合框架中不同视角之间的关系。

最后,本文基于中国情境,运用QCA方法探索驱动EMNEs天生全球化的因素,响应了学术界在天生全球化研究中运用综合视角、建立系统框架的呼吁(Cavusgil和Knight,2015)^[13],进一步凝练了EMNEs国际化发展的机理。已有研究从不同微观视角分析了天生全球化的线性影响(Fu等,2017)^[10],但是否国际化对于新创企业是一个复杂的决策,决定“出海”也应该被视为是企业资源整合后的理性选择。本文丰富了天生全球化研究领域的方法工具箱,为揭开“EMNEs天生全球化之谜”提供了思路,也为呈现以中国跨国企业为代表的EMNEs天生全球化动因的复杂性提供了经验数据支持。

2. 研究启示

本文所得结论不仅是对中国企业天生全球化问题的有利补充,也有助于拓展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同时,也为新创企业面临不同环境时灵活运用资源开展国际化提供理论参考。根据研究结论,本文的启示如下:

在微观层面,企业应根据新创企业自身的实际条件和所处环境决定是否开展国际化。第一,企业应当利用创新优势培育国际竞争力。社会关系网络不足的新创企业应重视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关注产品的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并在进行国际化研发和经营时,有意识地丰富国际化网络资源。第二,建立多元的董监高团队。将拥有社会网络的优秀人才纳入企业的管理团队,帮助其快速拥有海外社会资源,有助于克服新企业劣势、后发者劣势和外来者劣势。尤其对于缺乏国际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应善于利用网络关系取得合法性、获取有效信息和开发新市场。第三,在网络关系资源不足情境下,企业的国际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国际化起到了助推作用,因此,应客观评估内外部竞争环境,有目的地培养、树立国际企业家精神,以此推动企业有效地发挥创新优势。此外,为正确选择是否天生全球化,EMNEs可以参考如下原则:首先,合理地评估新创企业的资源,识别出企业拥有的国际化优势,依据资源类别(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匹配选择合适的国际化战略(是否天生全球化)。其次,了解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前因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挤占效应还是叠加效应),充分利用、协同互补,提高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后,把握企业创新资源、创新能力、社会关系网络和董监高团队的动态变化,明确资源的重要排序,发挥重要因素的核心作用,优先选择高效的天生全球化路径。

从政府角度,应为新创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以探索型对外直接投资、获取创新技术和开展技术开发为目的的企业的国际化提供政策支持。本文发现,风险承担性存在出现在所有组态中,意味着该条件对EMNEs天生全球化尤为重要。这一发现启示政府,应当激发企业活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并在国际竞争愈加激烈、对中资企业海外审查愈加严格的形势下,扮演好中国跨国企业“保障人”的角色,降低海外投资的不确定性,推动其快速国际化并占有国际市场份额。本文还发现了海外社会网络的关键作用。因此,政府要重视外籍优秀人才、优质“海归”,积极组织成海外社会网络交流互动的平台,并建立优秀人才引进绿色通道。

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值得未来进一步探讨。虽然本文参考主流文献从创新优势、海外社会网络和国际企业家精神三个层面识别出多个前因条件,但难免存在疏漏。比如,由于数据的限制,该框架未包含国际营销能力,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加入。此外,本文关注的是企业微观层面的前因变量,而行业层面或者国家层面的因素也可能是导致企业成为天生全球化企业的动力,未来研究可以纳入更多层面的前因条件,探索出更丰富的组态结果,以提供对企业天生全球化更为细致和深入的理解。再者,本文采取二手数据提取中国的天生全球化企业代表EMNEs,驱动机制挖掘的深度可能不足。未来研究可考虑借助问卷调查法,进一步深入剖析EMNEs天生全球化背后的驱动机制。

参考文献

- [1] Johanson, J., and J.E. Vahln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Firm—A Model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Foreign Market Commitment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77, 8, (1): 23-32.
- [2] 江诗松,游文利,杨帅,陈漪澜. 中外合资经验对跨国并购绩效的非线性影响:跨组织过程的学习模式[J]. *天津:南开管理评论*, 2022, (3): 25-36.
- [3] Knight, G. A., and S.T. Cavusgi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the Born-global Firm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4, 35, (2): 124-141.
- [4] McKinsey, C. O. *Emerging Exporters: Australia's High Value-added Manufacturing Exporters* [R]. Melbourne: Australian Manufacturing Council, 1993.

- [5] Oviatt, B. M., and P. P. McDougall. Challeng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heory: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7, 37, (2): 85–99.
- [6] Oviatt, B. M., and P. P. McDougall.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5a, 36, (1): 2–8.
- [7] Oviatt, B. M., and P. P. McDougall.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4, 25, (1): 645–641.
- [8] Love, J. H., S. Roper, and Y. Zhou. Experience, Age and Exporting Performance in UK SMEs[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6, 25, (4): 806–819.
- [9] Sharma, D. D., and A. Blomstermo.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Born Globals: A Network View[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3, 12, (6): 739–753.
- [10] Fu, X., J. Hou, and M. Sanfilippo. Highly Skilled Returnee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NEs: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6, (3): 579–591.
- [11] Zahra, S. A.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A Decade of Resear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5, 36, (1): 20–28.
- [12] Zhou, L. The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Proclivity and Foreign Market Knowledge on 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7, 42, (3): 281–293.
- [13] Cavusgil, S. T., and G. Knight. The Born Global Firm: An Entrepreneurial and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on Early and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5, 46, (1): 3–16.
- [14] 杨忠, 张骁, 陈扬, 廖文彦. “天生全球化”企业持续成长驱动力研究——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差异性跨案例分析[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7, (6): 122–136.
- [15] 薛求知, 周俊. 国际新创企业竞争优势形成机理研究[J]. *上海: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7, (5): 1–8, 31.
- [16] Fiss, P. C. A Set-theoretic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Configur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 (4): 1180–1198.
- [17] 张明, 陈伟宏, 蓝海林. 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 94 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9, (4): 117–135.
- [18] Zander, I., P. McDougall-Covin, and E. L. Rose. Born Globals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volution of a Field of Research[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5, 46, (1): 27–35.
- [19] Vahlne, J. E., and J. Johanson.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Evolution: The Uppsala Model at 40 Yea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7, 48, (9): 1087–1102.
- [20] Cavusgil, S. T., and G. Knight. *Born Global Firms: A New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M]. Business Expert Press, 2009.
- [21] Fernhaber, S. A., and D. Li. The Impact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on New Venture International Entry and Performanc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0, 34, (1): 1–30.
- [22] Marcotte, 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 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Contextual Issu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 Research*, 2014, 20, (1): 42–65.
- [23] Gerschewski, S., E. L. Rose, and V. J. Lindsay. Understanding the Drivers of International Performance for Born Global Firms: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5, 50, (3): 558–575.
- [24] Hong, J., C. Wang, and M. Kafourous.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5, 26, (1): 45–62.
- [25]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1): 99–120.
- [26] Behl, A., S. Kamboj, and N. Sharma, et al. Linking Dynamic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Service Innovation for Born Global Service Firms: An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Len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23: 101044.
- [27] Buckley, P. J., and M. C. Casson. The Internalisation Theory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A Review of the Progress of a Research Agenda after 30 yea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 (9): 1563–1580.
- [28] Knight, G. A., and P. W. Liesch. Internationalization: From Incremental to Born Global[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6, 51, (1): 93–102.
- [29] Oviatt, B. M., and P. P. McDougall. Defining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odeling the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5b, 29, (5): 537–553.
- [30] Weerawardena, J., G. S. Mort, and P. W. Liesch, et al. Conceptualizing 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Born Global Firm: A Dynamic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7, 42, (3): 294–306.
- [31] Coviello, N. E. The Network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6, 37, (5):

713-731.

[32] Coviello, N. E., and M. P. Cox. The Resourc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 Network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06, 4, (2): 113-132.

[33] Mort, G. S., and J. Weerawardena. Networking Cap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How Networks Function in Australian Born Global Firms [J].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2006, 23, (5): 549 - 572.

[34] Rialp, A., J. Rialp, and D. Urbano, et al. The Born-global Phenomenon: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Resear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2005, 3, (2): 133-171.

[35] Miller, D. The Correlat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ree Types of Firms [J]. *Management Science*, 1983, 29, (7): 770-791.

[36] McDougall, P. P., and B. M. Oviatt.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Intersection of Two Research Path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5): 902-906.

[37] Acedo, F. J., and M. V. Jones. 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Insights and a Comparis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Exporters and Domestic Firms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7, 42, (3): 236-252.

[38] Vanninen, H., O. Kuivalainen, and L. Ciravegna. Rapid Multinationalization: Propositions for Studying Born Micromultinational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6, (2): 365-379.

[39] Autio, E., H. J. Sapienza, and J. G. Almeida. Effects of Age at Entry, Knowledge Intensity, and Imitability on International Growth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 (5): 909-924.

[40] Freeman, S., K. Hutchings, and M. Lazaris, et al. A Model of Rapid Knowledge Development: The Smaller Born-global Firm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0, 19, (1): 70-84.

[41] Kontinen, T., and A. Ojala. Network T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of Family SMEs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1, 20, (4): 440-453.

[42] 陈小梅, 吴小节, 汪秀琼, 蓝海林. 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整合过程的质性元分析研究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21, (11): 159-183, 11-15.

[43] Clercq, D. D., H. J. Sapienza, and H. Crijn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 (4): 409-419.

[44] 赵云辉, 陶克涛, 李亚慧, 李曦辉.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 QCA 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 [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20, (11): 118-136.

[45] 吴先明. 企业特定优势、国际化动因与海外并购的股权选择——国有股权的调节作用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7, (12): 41-57.

[46] Fainshmidt, S., M. A. Witt, and R. V. Aguilera, et al. The Contributions of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t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0, 51, (4): 455-466.

[47] 杜运周, 贾良定. 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 (QCA): 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 [J]. *北京: 管理世界*, 2017, (6): 155-167.

[48]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 (6): 1360-1380.

[49] Papamitsiou, Z., I. O. Pappas, and K. Sharma, et al. Utilizing Multimodal Data Through fsQCA to Explain Engagement in Adaptive Learning [J]. *IEEE Transactions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2020, 13, (4): 689-703.

[50] Ragin, C. C., and P. C. Fiss. Net Effects Analysis Versus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An Empirical Demonstration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51] Schneider, C. Q., and C. Wagemann. Set-theoretic Method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 Guide to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52] Luo, Y., and R. L. Tung.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of Emerging Market Enterprises: A Springboard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 (4): 481-498.

[53] Mathews, J. A. Dragon Multinationals: New Players in 21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23, (1): 5-27.

[54] 毛其淋, 许家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 [J]. *北京: 世界经济*, 2014, (8): 98-125.

[55] Evers, N., and C. O'Gorman. Improvised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New Ventures: The Role of Prior Knowledge and Networks [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11, 23, (7-8): 549-574.

[56] Choquette, E., M. Rask, and D. Sala, et al. Born Globals——Is There Fire Behind the Smoke?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7, 26, (3): 448-460.

[57] Pereira, V., Y. Temouri, and K. N. Shen, et al. Exploring Multilevel Innovative Ecosystems and the Strategies of EMNEs Through Disruptive Global Expansions - The Case of a Chinese MN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2, 138, (1): 92-107.

The Motivation of the Born Global Enterprises from Emerging Economics:A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QCA Method

YU Pei, CHEN Yi-lan

(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with the market expansion and the deepening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trend of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merging economi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MNEs) have begun to integrate and allocate resources globally, aiming at cultivating strong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Uppsala model provides a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process of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holds that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 process of learning or accumulating knowledge, and as a result, acquiring experience becomes the motivation for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internationalization. However, some enterprises have made significant overseas investments and obt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without following such path dependence. The emergence of born global enterprises has greatly weakened the realistic explanatory power of traditiona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theory, leading to a theoret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ppsala model and the born global. Although this phenomenon has prompted scholars to investigate what factors lead to born global, few studies have got in depth and obtained remarkable findings.

Based on 178 OFDI events conducted by Chinese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8–2019,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explains the reasons why a group of EMNEs are born global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composed by innovation advantages, overseas social network and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is used to reveal the complex causes of the born global EMNEs. The results of the configurat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multiple concurrency” of innovation advantages, overseas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conditions form diverse configuration patterns of born global, with the obvious characteristic of “different paths leading to the same destination”. Namely, the seven elements, such as innovation outcome orientation, innate innovation orientation, innovation process orientation, weak relationship network, strong relationship network, action foresight and risk-taking constitute six paths and four modes of born global EMNEs. Further,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inside different antecedents, that is, in terms of innovation advantages, the stack effect or the crowding effect between the pairs of innovation outcome orientation, innate innovation ori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rocess orientation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while and the crowding effect between weak and strong relationship networks in terms of overseas social networks.

Compared with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has probably made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plores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multifactor combinations for born global EMNEs, by integrating factors of innovation advantage, overseas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EMNEs need to couple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to overcome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The existing studies still remain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however, this paper innovatively utilizes QCA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born global under the multi-perspective theory. Secondly, it provides richer insights and evidence on the modes of born global EMNEs. It proves that a single element cannot successfully drive born global enterprises, and different elements have complex interactions with each other. This finding cracks the dilemma that the traditional single perspective cannot adequately explain the phenomenon of born global, and it also further ref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the integration framework of born global. Thirdly, based on the Chinese scenario,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drive the born global EMNEs by using the QCA method, responding to the cal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ystematic framework and mechanism of born global. By using the QCA method, this paper not only enriches the methodological toolbox in the field of born global research, but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data to support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ypicality,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motivation of born global represented by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Key Words: born global;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merging economy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JEL Classification: F23, M10, G34

DOI: 10.19616/j.cnki.bmj.2024.01.006

(责任编辑:刘建丽)